UP主病故，网暴继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杰

赵上上喜欢唱歌和健身，投篮也很准。她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再有一年就要开始赚钱。24岁，赵上上确诊肺癌晚期。

她化名“卡夫卡松饼君”在B站和微博上制作vlog。第一期，她对着镜头讲了5分钟，语气温柔且平淡地告诉大家拍视频的缘由和确诊的过程，满屏的“加油”和“可爱”弹幕遮住了她年轻的脸。很快，她上了B站热门。

只过了一个月，赞美她的弹幕被另一层覆盖——咒她去死的“R.I.P”(安息)、讽刺她的“财富密码”“医学奇迹”和“祝你早日被病魔战胜”。

1

起因是“小肚腩”。

2019年8月，赵上上正在学校，课间开始咳嗽，咳了“一手的血”。确诊时，美国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和骨头，乐观情况下能活5到10年。

赵上上在视频里说，自己生病以来唯一一次哭是确诊时，“白人护士小姐姐”拿着结果冲过来抱住她，哭得厉害，她也跟着掉了泪。“她没把病情想得那么重，可能未来有新药，这个病就不算什么了。”赵上上的舅舅易立民说她天性乐观。

2019年跨年，她是在美国的医院度过的。那一年，她拿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实习，大四获得了院长奖，荣誉学生毕业，拿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7月中旬入学，8月底确诊癌症晚期，9月底做了第一个视频，得到国内脱口秀演员的支持，观看量100万。

“我就是个普通小姑娘，喜欢的小哥哥不喜欢我，我也是会哭的。”网友能感受到她的洒脱和可爱，刘一鸣在每个视频下给她“一键三连”，点赞、收藏、投币（虚拟币）。刘一鸣出生于2002年，在中国地质大学读大一。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带给我们的永远是阳光灿烂的笑容。大家的第一印象是，这么年轻怎么得了这个病，很惋惜。”

“满屏的弹幕和评论都给我加油，真的很壮观"微博和B站的私信都炸了，完全看不完。”赵上上在接受自媒体“故事FM”采访时说，她上午健身，下午看私信，愣是一周都没看完。私信有要联系方式的，说不给就要去跳楼；有个姑娘说自己想寻短见，看了她的视频重新振奋；还有家里长辈跟她得了一样的病，看她的视频打气。

“我觉得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大家说得那么好，不管是对我外貌上的评价也好，还是对于我精神层面的表扬也好，我都是受之有愧的。”赵上上表示。

她在咨询了医生意见以后，仍然保持着健身的习惯。2020年2月3日，她健完身，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全身自拍照。在涌入的鼓励和夸赞评论里，有这么一条留言：“松饼君好像有小肚腩哦。”

“我本来心情特别好，突然看到这么一条评论，瞬间有一种一瓢冷水浇在头上的感觉。”赵上上对“故事FM”说。当天晚上，她特意为这条评论制作了一期视频，像是临时起意，镜头对着床脚，光线很暗，全程没有露脸，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不客气：

“我真的就觉得女生把自己P成锥子脸也好，整容也好，就是被这种人施加压力去做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女生真的是有太多的一种外形、外貌上的压力。人家小姑娘发个照片，你不喜欢你别看对吧？你一定要凑上去指责一句，好像你就有高贵感了，是吧？你就觉得我能挑刺，不错了。可把你能的，你是有腹肌咋的，八块腹肌拿出来。我也不是生气，我就觉得这种人真的就是在朋友圈，你发张照片在底下说胖了，没P好，线歪了，就这种人的存在，特别讨厌。如果没有人骂过你，我今天就要骂一句，你真的是我特别讨厌的男生类型。讨厌你讨厌到，我想发支视频来骂你！That's it。”

2

2019年10月，赵上上肺部的肿瘤已经从5厘米缩小到3.2厘米，肝脏的肿瘤从4.2厘米减到0.9厘米。后来，她还幸运地拿到了靶向药，医药费由当地保险负担，无需发愁，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互联网的世界里正相反。小肚腩事件视频下有人回复：“和你第一支视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像电视剧里的叼嘴婆婆。”她也不示弱：“连我妈都说我脾气不好，不要对我有什么很温柔之类的错误幻想。"我有小肚腩这句话单拎出来不是什么恶毒的话，甚至是事实。但我选择把它发出来，没P图，用你来说吗。”

她以前在低纬度的佛罗里达州上学，坚持打太阳伞，不理会身边同学嘲笑，秉持的态度是“反正最后又不跟你结婚，我管你怎么看我”。

很快，她又做了一期视频，标题是《网络喷子走好不送》。有网友评论：“姐姐还是好好治病吧，不要把B站不舔你的人都拉黑啦，都吐血了还不住院的吗？脾气这么怪，真的把自己当小公举（主）了，家里面当小公举（主）就行了，放网络啥也不让别人说其他的话，只能夸你、赞同你真是奇了怪。”

这一次，“卡夫卡松饼君”准备好要说的话，面对镜头回怼：“咒人住院，你是多有父母生没父母教？对，我父母就是愿意把我宠成小公主……我高配顶配天仙配。我知道你道歉了，可道歉有什么用，你也19了，是个成年人了，成年人是需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说出口的话就要有不被原谅的准备。”她把那条评论没打码挂了出来，“我也不认为一个人攻击了我，我还得帮他做掩护，不让大家知道他是谁。”

“卡夫卡松饼君”的粉丝很快攻陷了被挂之人的微博，又人肉出他们的姓名、学校、照片等，逼得对方不得不删号。赵上上曾在微博解释自己并不是在意小肚腩，“只是当被挂的风险被更多人知道的时候，喷子说话才会稍微过点脑子，稍微保持点做人的善意。”

那段时间，赵上上的粉丝大涨，大批B站用户发现了她。紧接而来的是反转。在嘉兴读大一的某男生从网上认识的好友那里听说了她，组队去评论区骂她，“因为网友一两句话就煽动粉丝网暴一个路人，我觉得是心眼小。”对她的指责逐渐延伸到用癌症赚钱和病历造假，vlog里的赵上上跑步撸铁，没掉头发，“刻板印象里这种绝症患者应该没法这样活蹦乱跳"我感觉是挺不齿的一件事，用自己绝症来赚钱”。

“会独立思考的人应该都会对她的行为感到气愤吧。”这位大一学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他还跟网友一起加入了反对“卡夫卡松饼君”的QQ群，曾经至少有145人在线，他们PS她的遗照和裸照，人肉她的学校、家庭住址等信息，群名叫“快乐向前冲”。她的视频也被拿来恶搞，她成了B站的一个梗。

另一位在山东读书的大学生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恰烂钱的病人”，他发布了一些侮辱性的言论。“我5年的B站账号都被那些粉丝搞没了。”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还有人给赵上上的B站私信，满屏的“还没死呢？”

一夜之间，赵上上从抗癌的乐观UP主成为网暴路人的恶人。

吕品觉得，“卡夫卡松饼君”的风评急转直下是因为自己做的视频。2020年3月的一个凌晨，他在网上闲逛，点入了“卡夫卡松饼君”的vlog，“了解了全过程”。“我们同情你是弱势群体，但我们一样不能容忍你纵容自己粉丝网络暴力，一脸自以为是，嘴硬挂人的态度。别人说她小肚腩，她不爽就把别人挂了，还要自信满满告诉大家‘我接受不了，所以我就让大家骂他’，那我接受不了这样挂人、网暴的行为，我是不是可以叫所有看不惯的网友一起骂她？”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快，他写了脚本，制作了一期视频，说“卡夫卡松饼君”是“财富密码”(指靠绝症赚钱)、“医学奇迹”(晚期还能健身撸铁)、“秒土转生”(死人复活)。

有人说赵上上并未直接参与网暴别人，吕品则认为“粉丝行为正主埋单这也很常见吧，何况她还是鼓动粉丝去集中攻击别人”。

吕品是一名陕西的高中生，即将高考，梦想考入四川大学。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卡夫卡松饼君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走了邪路了。”

支持“卡夫卡松饼君”的刘一鸣为她辩解，生病的人心理可能会扭曲，你可以批评她挂网友的行为，但是发R.I.P(安息)就过分了。“咱们都是生人，谁会好端端希望人死呢？”他发了一条评论：“如果是真的，我希望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我还是希望是假的。”许多人骂他是“孝子”。

这句还有其他版本：“如果是真的，我希望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我希望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希望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你全家都有。”

3

2020年2月28日，赵上上晒出病历，“这两天住着院，莫名收到大量有组织的攻击，自诩正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可能造成伤害？”

2020年1月底，她来中国探亲，回美国前拍了一张照片，舅舅易立民已经看出她的脸色不好。刚到美国，她差点进了ICU，左右手两个留置针，尿管也插了，心率、血压不稳。医生从她的右侧胸腔抽取了600毫升积液，夜里又抽取了900毫升，“大可乐瓶，抽了一瓶”，易立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赵上上的床头有一个可以自己控制打止疼药的机器，她笑称“真是一键掌握痛苦人生”。

就在这时，她打开自己的账户，铺天盖地的骂声袭来，在病情和恶评的围攻下，她哭了一个小时。

3月，她对粉丝说：“虽然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但还是请我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不要去人肉那些伤害我的人。他们这么伤害我终究会有报应的，但我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施行者，也不希望你们成为那样的人。”但这并不能平息战争。

晒完病历，她专门做了一期视频，邀请自己的医生证明病情，但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假的吧，病历连公章都没有"手部动作太多，明显在撒谎"演技不合格”。一位一本学校的研究生专门给医院发了邮件，询问是否有这名医生，“当时回复是没有这个stuff(员工)”。后来他得知“联系的官方貌似没有医生名单。”

吕品发了那个视频后，局势很快不受控制。他制止别人人肉赵上上的信息，看到了就举报，“我讨厌把个人行为上升到家庭，说不定真有人敢线下找她麻烦。牵连别人一家是不好的行为，而且相较于网暴已经大大地严重了，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现实。”

他把现实和网络世界做了区分，他从初二开始写网文，科幻玄幻都市灵异奇幻，“网上那点事有什么成就感可言，不会给我的履历增光”。当被问到生活中有没有“卡夫卡松饼君”这样的人时，吕品的答案是“真没有，优越感太浓，不是一般人模仿得了的”。如果在现实中遇到赵上上，吕品说“她肯定不会理我，一个高中生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虽然我很想让她公开道歉，她只会把我当神经病。”

吕品说，朋友是朋友，陌生人是陌生人，更何况这些人还是网友，“她可能根本不在乎网友的态度吧”。

有人在豆瓣上说，夏天去赵上上家留宿时，凌晨，她曾尖叫着醒来，哭着大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她在一期vlog里说：“我从来就没有让大家给我募捐过，为什么你们要骂我恰烂钱？为什么在我被你们逼着出示了病历之后，你们还有那么多的借口和理由说这是假的？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别人？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有多痛苦？”

赵上上的舅舅易立民是法律工作者，他在2020年3月收到几次外甥女的求助，“这些人有组织地进行人身攻击，可不可以告他们。”易立民生于上世纪60年代，没用过B站，他说网络上一些人就是吃了饭没事做，计较不完，就当做没看见。

从法律层面，他觉得“告不过来”，对名誉权侵权的惩罚力度也不大，作恶的成本很低。侮辱罪、诽谤罪一般是亲告罪，亲告罪的特点是受害人很难获得相关证据。所以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如果是网络侮辱和网络诽谤，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由公安机关来收集证据。但是基于互联网虚拟性与匿名性，证据随时可能被删除、篡改，仍然不容易收集。

4

2020年8月1日，赵上上更新了最后一条视频，记录她用两个月跑完100公里的时刻，跑完好开心，对着镜头喊了一声“好了，卡！”

2020年12月11日，赵上上在美国去世，身边有母亲和几个同学。临走前一天，易立民接到妹妹的电话，赵上上已经喊不出“舅舅”两个字了。此前，医生问她昏迷了是否要抢救，她说“不让我痛就行了，不要抢救”。

人们从她的微博上窥见她患病的片段：“我尽量想把我的疼痛描述得不那么惨烈和难过。大概就是，你背上被人装了块局部钢板。然后有人在一天当中随机抽时间拆钢板。把你当铁臂阿童木玩。"每次做活检，都像本来好好的一盒冰淇淋，被人捅进去挖了一勺的感觉。”

她的最后一条微博发布于去世前的3天：“很多事情都是没轮到自己头上，所以能在旁边为虎作伥，叫嚷熏天。”那一晚，她的情况恶化，医护在夜里奔进病房，告诉家属做好思想准备。

她的微博设置了半年可见，留在上面的印记正一天天消失。她曾说过“我真的要哪天去世了，我肯定在走之前把微博会员充它个一百年，置顶微博上把这些人的ID和他们说过的内容全部放上去做墓志铭，再用全部遗产买全平台热门。”

B站在她去世后发布声明，“我们得知UP主‘卡夫卡松饼君’因癌症在美国波士顿某医院去世，享年25岁……我们将在取得其直系亲属确认和同意后，将其列为‘纪念账号’加以保护……”那些骂她的弹幕和吕品做的视频一起消失了。

有个网友在赵上上去世后，给曾攻击过她的人留言，“人真的去世了，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得到的大部分答案是沉默，其次是敷衍的道歉，还有人表示无所谓，也有个别继续攻击她的人。一位网友在她在世时写下“R.I.P”(安息)，她去世后再次写下“R.I.P”。

吕品在赵上上离开后，成为新一轮网暴的对象，“她的粉丝来翻旧账，更多不知道真实情况的人涌入，就以为我是欺负癌症患者的罪魁祸首”。B站私信往下一翻，全是骂他的，“路人只想骂我来彰显自己的正义感”。

在“故事FM”的采访里，赵上上说“我把所有稍微不那么友善的评论都当成了攻击，我以最恶毒的角度去猜想了别人。这是我做得最不好的地方。”她说自己联系了其中一位被集中网暴的网友，进行了诚恳的道歉，也得到了对方的原谅。对方甚至很诧异居然能够引起后续这么大规模针对她的网络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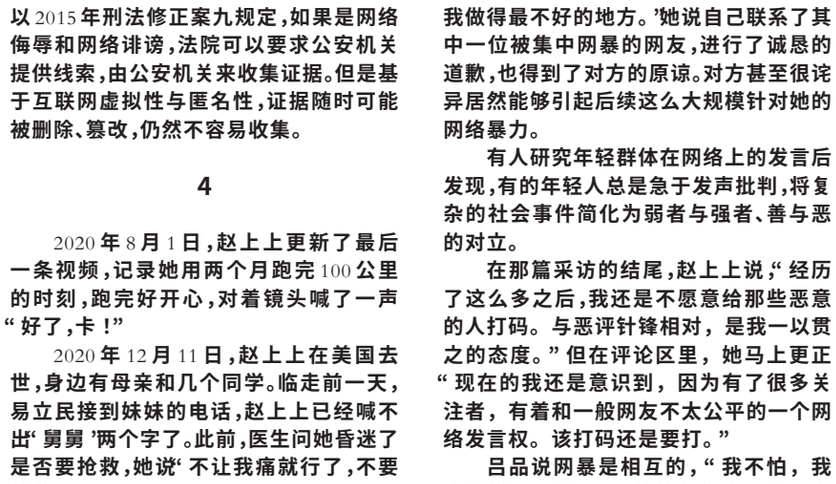
有人研究年轻群体在网络上的发言后发现，有的年轻人总是急于发声批判，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

在那篇采访的结尾，赵上上说，“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还是不愿意给那些恶意的人打码。与恶评针锋相对，是我一以贯之的态度。”但在评论区里，她马上更正“现在的我还是意识到，因为有了很多关注者，有着和一般网友不太公平的一个网络发言权。该打码还是要打。”

吕品说网暴是相互的，“我不怕，我也没错，不是吗”。他的偶像之一是圣女贞德，因为她一生没有污点，“死后连敌人都赞美她”。

网暴发生前，赵上上曾在一期视频里平和地说：“互联网确实什么人都有，总的而言，我的微博就像一套房间里靠近壁炉的那一小块地方，柴火噼里啪啦响着，火星在跳跃，大家聚在一起，拿着热可可，一切都有希望，未来都有盼头。”

后来，她的感慨变成：“互联网是无法真正共情的。面对面说话都有可能产生误会，隔着根网线和屏幕又怎么说能理解。”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思想的邮差，温和地走

2008年10月22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在北京三联书店外。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

沈昌文晚年还常出现在北京街头。他脖子上挂着U盘和PDA(掌上电脑)，肩上背着双肩包，常去位于美术馆东街22号的《读书》杂志编辑部“约会”。那里有一台复印机，他称它为“复小姐”，那是他的“情人”。

他要带着U盘去找那个“情人”。U盘里装着他在网上寻来的文章，他一开印，其他人的复印得往后排，打印纸和墨盒，因为他的到来而需要频繁更新。

离开时，他的双肩包总是被塞得鼓囊囊的。有时，包里还塞着他在旧书市场淘来的书。这些文章和书，不久后就会出现在一些朋友的信箱或所在单位的收发室。这好似家常便饭，沈昌文下雪也送，这种上门服务很多友人都享受过，费孝通的助手张冠生多年来积攒了几十本。

退休后的20余年里，沈昌文一直坚持这样在北京城转悠，早些年胯下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后来自行车骑不动了，他就坐着公交车或者步行，一边听邓丽君的歌，一边在京城四处游荡。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读书》杂志编辑部是在2020年10月底，那时他已经被确诊肝癌晚期。

用草鹭文化董事长、真格基金创始人王强的话来说，沈昌文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邮差，无数件装着思想和文字的包裹得以经他的手踏实地传递给每一位如饥似渴的中国读书人。

那些文字印在自1980年3月至1996年1月的100多期《读书》杂志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书里。沈昌文是那个时代的《读书》杂志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这个最高上到初中一年级的老者，被认为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是如今这个“邮差”再也没办法亲自送那些“包裹”了。2021年1月10日，女儿发现，90岁的沈昌文在睡梦中辞世。半个多月里，文化界关于他的哀悼与追思一直在持续，人们怀念他主持的《读书》和三联书店，以及那个时代。

他1980年4月起担任三联编辑室主任，兼《读书》杂志负责人，1986年1月1日成为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第一任总经理，直至1992年12月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但继续任《读书》主编至1996年1月1日退休。

王强把《读书》杂志比作一个交换思想的集市，“这个集市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的东西，体现了一种自由、美、高尚道德”。“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建构上，如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史学家雷颐说，《读书》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启蒙刊物，一个风向标。

有人评价沈昌文的一生是“为了书籍的一生”，他却时常自嘲是“学徒工”“书贩子”。其实他的人生，要远比任何人的述评复杂。

沈昌文生于1931年的上海滩，家道中落，自幼失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考进人民出版社。“文革”期间全家被迫下放至湖北咸宁农村，经历数次风波后，从校对员起步当上主编、总经理。退休后，他迎来自己出版生涯的“黄金时期”。

沈昌文曾说过：“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求生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他自称“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的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为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地办了恁多年。”沈昌文说。

“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自己不说让人家说。”沈昌文将办《读书》杂志的经验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我。在杂志编辑部，除了主编沈昌文的出身是银楼学徒工外，编辑队伍里还有当过油漆工的、开过卡车的，稍微强一点儿的是当过“工农兵学员”的，没什么学历与专业知识。王蒙曾经评价，这是《读书》杂志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

沈昌文办过读书“沙龙"俱乐部”，后来，从电视厂售后服务的广告得来灵感，活动改名为“《读书》服务日”，每月一次，没有主题，不限形式，租个咖啡馆，摆十几张桌子，读者、作者花三两元买某个一起闲聊的下午，编辑活动其间，讨教主意。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就是在喝咖啡时聊出来，后来成文发表。

活动地点有时是东四附近的点心店，有时是朝阳门外的冰激凌店，或者咖啡店。王蒙每月必去，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来参加过。有商人“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

沈昌文还爱组织饭局，这是他联络作者的“法宝”。他带王蒙吃过大闸蟹，带郝明义吃过臭豆腐，带陈冠中吃过洄鱼，带许纪霖喝过豆汁。饭局也就成了他约稿和聊出版选题的地方。

朋友们称他为“饭局局长”。他因此引来过批评，但靠着“吃”，他征服过不少文人。李泽厚、金庸、罗孚、秦晖、钱理群等都曾出现在他的饭局上。

他也确实爱吃，尤其是红烧肉。他负责《读书》杂志时，编辑部常有红烧肉的香味飘出来，当然，也有啤酒、咖啡，它们一起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部里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

“编书犹如下厨。”他年轻时常开玩笑：“想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再传递给读者。他喜欢把认识的不认识的拢到饭桌上，让他们彼此认识、交流，甚至争论。很多人都成为他的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在这本不大的杂志上，他们探讨不准用“?”的生活，谈论中国女性的问题，思考商品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去向。那些作者的一篇篇文章又经《读书》编辑部汇集成刊，变成一个个“思想文字的包裹”出现在全国各地读者的手上。

这样的包裹曾寄到内蒙古一个离退休的老头特吉斯手里，让他不再是那个“闭目塞听的可怜虫”。他从1983年就开始订阅《读书》。在1996年元旦写给《读者》编辑部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买到《读书》介绍的好书《顾准文集》，他寻遍呼和浩特的大小书店。亦有身处国外的读者，在国外图书馆遍寻无果，回国后带着几本杂志出国，杂志在朋友间流转。

1981年，在一次饭局上，华裔作家韩素音向沈昌文介绍了《第三次浪潮》，并随后寄来一本英文本。沈昌文先找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了部分章节在《读书》连载，那些内容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1984年，该书公开发行。钱学森专门写过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指出“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沈昌文看来，那些年他经手出版的书中，最有名的是美国作家房龙的著作，尤其是《宽容》。沈昌文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回忆道：“几经研究，我觉得他的《宽容》最符合当前需要。我们多少年来，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受的教育都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当然要改变，要提倡宽容，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自由、更多生机和活力。”

这本1985年出版的书影响很大，吕叔湘后来专门夸赞过沈昌文，“这题材选得好”。沈昌文去世后，有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父亲带他去汉口的书摊花2.05元买下《宽容》的那天，父亲说“这是好书”。

“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的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主编，恰恰能够开出一个百花齐放、自由争鸣的杂志。”1986年就开始成为《读书》作者的葛兆光说，沈昌文没有偏见，这是他最大的好处。

那时，经沈昌文手出版的书还包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杨绛的《洗澡》、蔡志忠的漫画、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出版杨绛的《洗澡》时，沈昌文被问“属于你的分工范围吗”，出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武侠小说尚在限制出版之列，还有“毒害青少年”的罪名。但这些问题都被沈昌文化解了，他说《洗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很强的人文思想”，最后出版方案都被批准了。这也是出版人陈昕觉得沈昌文最令他敬佩的一点，“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

在出版界干了一辈子，敬重沈昌文的人不少。他把多年积攒的人脉和和五花八门的京城餐馆都放进脖子上挂着的PDA里。他曾形容自己的晚年生活就是“做媒”，有媒体记者找到他，寻找某位作家的联系方式，他立刻找到就给。

暮年，沈昌文送走了许多人。一起张罗“思想操练”的费孝通、吕叔湘、金克木、许国璋、陈原、范用……他组局的机会越来越少。

73岁的时候，他说自己的思维已经衰退了，但肠胃功能还很好。他还是愿意参加年轻人组的饭局，每天和有学问的人一起吃喝。有时候，免不了带几本从旧书摊淘来的书，供朋友们挑选带走。

晚年，他最常待的地方是西总布胡同里60余平方米的“书房”。《文汇报》编辑陆灏去过那里，在那些被沈公的藏书摆满的房间里，陆灏见过周建人为沈昌文题的一幅字，写着他哥哥鲁迅的诗：“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子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上个月，陆灏得知出院后沈昌文胃口一直不太好，就给他寄去醉蟹和秃黄油，这是沈昌文最爱的家乡味。确诊肝癌晚期后，沈昌文在医院没住几天，就闹着要出院。虽然他那时耳朵已不大听得见，胃口也不怎么好，但出院后，又像好人一样开始工作，每天忙个不停。

陆灏问沈昌文的女儿：“老沈最后几天说过什么？”

“他说对你的醉蟹最喜欢，我晚饭时给他夹出一只，他就乖乖地问我，喝一个啤酒吧，有螃蟹，其实他已经不大吃饭了，但能吃完一只蟹。最后一天是周六，从白天就迷糊，像是在微醺状态下，我用按摩锤敲打他后背，他一副舒服的样子。”他女儿说。

胡同里的邻居最后一次见沈昌文是2021年元旦过后，他照旧背着双肩包去书房，独自一人。

书房里的书堆得很高，他在那里上网，看书，或者听邓丽君的歌。透过书房几扇朝南的窗户，看得见泛黄的旧书积在阳台，冬日斜阳洒在某酒家的手提袋上，几支毛笔静静地挂在朝北窗台的笔架上。这在那栋红白相间的小楼里算得上显眼。只是，如今那些旧日的纸与笔再也等不来它们的主人。